

引 论

第一节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缘起

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缘起与必要性

(一 现代化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方向

16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它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多元化、多阶层的社会结构为依托，以民主制度为基本保障，以自由、平等、独立的意识形态为根本的驱动力，为了人类和谐、幸福的终极目标稳固而有序地发展着。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不管它的传统是如何的悠久与伟大，只要想在这个世界化的地球上继续存在、发展，现代化必定成为其无可逃避的惟一选择，这正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迟至大约两个世纪以后，中国，这个曾经创造了人类社会最辉煌的文明，并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封建大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和廉价商品的双重夹击之下，被迫逐渐离开传统的发

展轨道，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

这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以后，自经济改革的洋务运动到制度更新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深入到思想文化层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短短 80 年的时间里浓缩了西方几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这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曲折的无可奈何的认识过程。背负沉重历史负担的中国士人对于现代化的目标选择始终如雾里看花、盲人摸象，长时间不得要领。固守传统的保守势力在与西化派的对峙中，几乎总是居于优势地位，即使是开明如严复、激进如梁启超的最初西化派，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也是不断地向传统复归，而在西化派的同仁中，对于转换的具体途径与方法等重大问题，也始终充满着激烈的争议和巨大的分歧。

然而，不管怎么说，“西化”也好，“资本主义化”也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也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毕竟已经开始向具有现代特质的崭新社会形态转变，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这恰如香港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所说，“世界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已明白地看出，中国的出路不应回到‘传统的孤立’中去，更不应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古老社会惟一可走并正在走的道路”。^①

近代明智的思想家不仅认识到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方向，“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举，势必趋而集于亚东”，^②而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2 页。

② 梁启超语 见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26 页。

且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轨迹。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逐渐认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最后要求人格的觉醒。1916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1卷6号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缘起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能抱残守缺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上述进化三期说，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发展规律，对此后的现代化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一度出现现代化研究的热潮，围绕中国现代化的目标选择、基本走向、主要手段与方式等重大问题，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

此后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革命史观”完全排斥了现代化研究；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深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代化”成为历史研究的崭新范式，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在谈及“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

近代史的意见’时就讲道：“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进程做了比较充分的探讨，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背景、走向、历程、特征、影响等，分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具体层面的现代化转换的特定规律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比较分析，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②

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首要前提以及终极目标的人的现代化转型，却始终缺乏自觉明确、积极有效的研究。在有限的研究成果中，也只是局限于少数思想家的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而对更深层次的人的普遍社会心理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一直缺乏应有的研究，这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实践是不相适应的。

（二）人的现代化 被长期忽略的研究课题

实践证明，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两个层面的整体变迁过程。物的现代化（经济、制度层面）与人的现代化交互发展、相演递进。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创设。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导动力，社会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其中，人的现代化是核心和主导方面。人的现代化是从人的观念、素质、能力、活动、交往、享受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普遍的、深刻的变化。社会的现代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林被甸：《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①

首先，人的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目标。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 就曾经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指出了人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因和最高目的，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基本标准。马克思强调指出：人只需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 真正依照人的方式 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 来安排世界 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离开了这个目的，社会发展就失去了起码的意义。所以，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归根结底 在于满足人的利益和需求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推动人的全面进步。

其次，人的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现代化的实际承担者。在社会发展中，无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还是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都要通过人才能实现。所以，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都要通过人、靠人的智慧、实践活动来实现；完成现代化，必须依赖人的素质及其努力，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等必须具有现代性。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民众的文明程度，这是被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所证实了的。恩格斯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 没有人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是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的。马克

① 李秀林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2 页。

斯·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缘起的考察，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新的社会条件、新的社会生活迫切地需要造就一代资本主义新人，这是建立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①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对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做了长达二十几年研究之后，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出警告，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能否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国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化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和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动用这些现代技术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同时，国际社会学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调查之后，也得出结论：“要重新调整以往研究国家发展的重点，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那些杰出的人。”

人的现代化，其实质是要求人在价值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它强调人的尊严与追求，鼓励个性，要求个人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世俗社会中发挥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②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8 页。

作用。^① 具体而言 在观念上 要实现由宿命论、迷信、宗教热忱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的转变 在交往上 实现由封闭的、地域型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世界性的人际关系转变；在行为上，从压制人的创造性向解放人的创造力和发挥人的潜能转变。^②

由于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对人的现代化转变的认识和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国民性问题展开，以国民性为话语的，因此，着力于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分析与阐释，就成为本书的主要内容。

二、国民性概念的界定

在当今学术界，国民性研究是一个公认的极为棘手的课题。对国民性的任何角度的阐述都很容易流于片面和歧义，以至于有人说：“从事民族性研究是一件注定要受指责的事。”^③这固然这是由于国民性内容的历时态变动性及其承担者——国民的广泛性所决定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国民性都是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并不断变动着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成不变的国民性是不存在的；而民众阶层的多层次性及其个体条件的巨大差异性，显然使得即使是同一集团内部成员间也不可能具备完全一致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国民性在横断面上的多样性和纵剖面上的变化性，使得那些想概括介绍某一民族文化，总结某一民族性格特征的努力几乎化为笑柄。“对那些抽象的概括，反驳者可以随意俯拾若干例外，来证明立论的不全面甚至不正确，或者

贝迪阿·纳思·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 知识出版社 1983年版 第6—9页。

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 纽约自由出版社 1976年版 第148页。

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9页。

称那些概括性的研究为缺乏具体分析的抽象演绎，缺乏历史发展观的僵化研究。”^①但是，一个更根本的障碍还在于学术界至今不能对国民性的概念做出明确一致的界定。近 100 多年来，国民性问题引起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的共同关注。这些学科使用“人格”、“民族性”等多种概念从不同角度深化了人们对国民性的认识；但是，由于这些学科切入视角的巨大差异，^②反而使人们对国民性的具体内涵模糊不清，这无疑从根本上制约了国民性研究的深入发展。所以，任何对国民性的研究，概念的界定与辨析都是第一步的。

（一）近代思想界对国民性的认识

作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是每一个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近代思想家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他们对国民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相对完整的认识过程，从最初的直观感受性界定“民气”到把握了国民性的基本内容的“国性”，再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性”、“国民性”，他们对国民性的概括渐趋准确。

1. 民气

针对洋务运动的偏颇，主张国民性改造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到有一种比“以兵立国”、“以财立国”、“以土地立国”显得更为重要的“民气”，“以兵立国者，兵穷而国尽；以财立国者，财穷而国尽；以土地立国者，土地劳而国尽。若以民气立，则民有一日

① 罗福惠：《国情民性与近代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0 页。

② 社会心理学关注具体心理过程的变异；社会人类学只是在对单纯的、小单位的原始部落的研究中取得了成功；文化学始终研究的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层次的思想文化的变化，从来就没有深入到社会心理及行为方式的层次。

未尽殄 而国固一日不能尽也。”民气强者 国家强也。”是以君子责民气。”显然，“民气”是近代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最初的直观感受，反映了他们对人的现代化转型的直觉要求。但是，他们对民气的界定基本上是着眼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根本没有注意到民众自身素质变化的要求，是故善治国者 知政府与人民之有相依赖也 故勿欺人民 勿负人民 勿秘人民 勿抑人民 勿强人民 勿妒人民。人民有所过 则较正之 人民无所过 则顺从之 人民所未知者，则引导之 人民所已知者 则扩张之 若是者 谓之养民气’。^①因此 可以说这一时期‘民气’的界定并没有涉及国民性的内涵。

2. 国风、国性

梁启超最早注意到民众的素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把“必画然有异于他国”的“国内之民之品性、趋向、好尚、习惯”称之为“国风”，指出“国风之善恶 则国命之兴替所系也”。^②这里，“国风”的界定显然是过于宽泛而肤浅的。

但是，梁启超很快就注意到教化，即国家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对国民品质的巨大影响作用，他指出“国民性”自其成者言之 则曰风俗、曰风气 自其成之者言之 则曰风化、曰风教。教化者，气与俗之所由生也”。他用国性来概括国民性的内容，认为国语、国教、国俗“三者合而国性仿佛可得见也”。具体而言，“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依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总之，“而凡可从为国民之资格者 则必其思想同 风俗同 语言文字

《论民气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

梁启超：《说 国风 上》，《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第2323页。

同患难同其同也”。^①这样他对国民性的概括从内涵上来说已经涉及人的道德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所以还是比较完整的。

梁启超认识到，国性是生活在一定地域中的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反映民族群体特征的特殊性格，它无影无形，却又无所不在，它不可具体言说，却又无所不包，弥漫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栖息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将民族的人群融合成一个牢固的实体。“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缘血统之联合，群交之渐靡刈，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其信条具有大威德，如物理学上之摄力，抟挽全国民而不使离析也；如化学上之化合力，熔冶全国民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②它是一种“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的“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③

国性是国家民族的根本，“苟本无国性者，则自始不能以立国。国性未成熟具足，虽立焉而国不固。立国以后，而国性流转丧失，则国亡矣”。它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不同的民族的国性迥然不同，“英人尊阶级，务形式，美人则重平等，乐简易，日本人最长于模仿，土耳其之国风，迷信而过于服从，蛮勇而疏于实务”。^④

这里的国性、国风指的是国民性的民族性内容，而忽略了国民性的时代性内容。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对国民性的时代性转换，

① 梁启超：《说 国风 下》，《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327 页。

② 梁启超：《国性篇》，《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554 页。

③ 余一：《民族主义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版 第 487 页。

④ 梁启超：《说 国风 上》，《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323 页。

显然还缺乏足够明确的自觉认识。

3. 国民性

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开始注意到了国民性的时代性内容的变更“夫国民性则亦犹夫一人之性焉尔 凡一民族之性 终不能有长而无短，而长短之数，有绝对的恒久不变者，有相对的与时推移者，而其所短，有积之甚久而难治者，有为一时之现象而易治者。今欲语中国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国民自知其所长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长矫变其所短而已”。^①

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民族性内容感到自豪，“而我国乃有天幸 藉先民之灵 相恰以为一体 宗教同 言语文字同 礼俗同 无地方部落之相残，无门第阶级之互阂，并世诸国中，其国民性之成熟具足 或未能我先也”。认为这是中国生存、发展的基础“我之具此浑融统一之国民性，即我国家亿万年不亡之券，吾侪所为怙恃之而能自壮者也”。^②

但是，当两个不同社会性质的民族相互冲突时，必然会引起国民性的变化，“顾吾以为当一社会之与他社会相接构，缘夫制度文物之错综颤受，而思想根本不免随而摇动，其人民彷徨歧路，莫知所适，其游离分子之浮动于表面者，恒极一时之险象”。中国的国民性缺乏鲜明的时代性内容，具体表现为“科学观念始终不发达”、“缺乏尚武精神”、“无爱国心”等；^③因此面临着时代转换的艰巨任务，1917年初，《新青年》（2卷6号）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

①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4页。

② 同上书第2476页。

③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页。

国民性及其弱点》的文章，作者光升在对中国和其他的民族进行了一番比较后得出结论，即误入迷津的中国国民性已不适应现代世界的生存方式，应加以彻底改造。

当然，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也认识到国民性改造的困难，“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其养成之也固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有功，其毁坏之也亦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为力”。^①

综上所述，近代思想家从横断面上考察了国民性的内涵结构，也认识到了国民性时代转换的必要性。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对国民性的概括仍然是零星不系统的，充斥着前后的矛盾冲突；而且即使在少数进步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内，国民性的概念从来也没有统一过。这些都反映了近代国民性概念界定的不成熟，也是制约近代国民性改造不能取得显著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目前学术界对国民性概念的歧义

建国以后，由于长期缺乏对国民性的足够研究，使得学术界对国民性概念的界定依然处于纷繁芜杂的状态，对国民性概念的阐释达几十种之多，我们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 4 种类型。

多数论者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心理特征、精神状态。它是在多数国民中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②或者说，它“是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

①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74 页。

② 参见刘克明、王克兴：《中国传统人格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现于民族共同文化特点上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①

沙莲香等则认为国民性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②这种形态表现为“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的总和，是人格的综合体”。^③而“人格的综合体是一个系统，是多种心理特质按一定的结构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心理特质有的是核心特质，有的是次要特质，核心特质与次要特质互相补充，共同构成有机的人格类型。”^④它反映了某种在民族内部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

还有人认为国民性指的其实就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国民性改造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崛起和中华民族在反思中深沉的觉醒。^⑤它从人的角度反省民族文化，并通过这种反省开始“人的现代化艰巨工程，即民族性格的改造”。^⑥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民族文化心理。^⑦

也有人根本就反对国民性的提法，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这

温元凯、倪端：《改革与国民性改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讨论》，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四号。

沙莲香：《中国国民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吕锡深：《道家与民族性格》，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参见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⑥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⑦ 参见崔志海：《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思想的先声——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

其中又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一个国家民族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不能说成是国民性。因为按字面讲，国民性就是全体国民都具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在阶级社会里，即使同一阶级的人也不一定都一样的思想。^①另一种认为，国民性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本性，不是天生的遗传性或什么“根性”，而是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应叫“国民积习”，它包括两个方面：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怯懦、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效率观念；专制主义压迫下形成的不良作风，如讲亲亲、重亲属关系、家长作风等。

另外，对于国民性是否有完整的体系以及国民性的主体到底是哪一个阶层等问题，也存在着分歧。鲍昌等认为，国民性是在某一主导阶级制约下的社会心理，并非各个阶级心理的融合，它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②邵伯周则认为国民性可以指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可以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及在其影响下所形成的某种精神状态，也可以指社会各阶级的人共有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④

（三）本书对国民性的界定

本书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近代思想界对中国国民性近代变

① 参见李何林：《从“国民性”问题谈阿Q正传》，《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页。

② 参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页。

③ 参见鲍昌：《论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思想》，《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

④ 参见邵伯周：《试论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见解》，《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149页。

迁的认识，它偏重于国民性的结构性内容的时代性转换，因此本书所说的国民性概念与文化人类学的人格概念和伦理学的人性概念以及社会心理学的民族性概念都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国民性与人格不同。国民性与人格都关注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但是，人格侧重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个体性，它是对个体心理面貌的高度概括，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为主导、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个人心理和行为特质的总和。它是“每个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状态(或特征)的有机结合”，主要用于指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特征。国民性则重点关注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社会性(或曰普遍性、共同性)，它是指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价值观、态度、认知、情感、自我意识等方面所表现出共同而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特征的总和。它考察的是由于受共同环境与文化的孕育而导致的个体人的性格中所含有的全体成员共有的心理和行为的特征。国民性研究的是民族或群体的“基本人格”或“众趋人格”。

其次，国民性与人性也有区别。所谓人性，是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本质本性的一种认识，反映了人对自身的觉悟，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对于人的具体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并不作为其认识的对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人性的认识，主要是对人的德性的认识，它把人看做是道德人，否定人的感性存在及感性本质的积极意义。近代学者则把人确定为感性的自然存在，把人的感性需要规定为人性的本质内容，并从中引申出利益原则，使得人性论变成成为资本主义张目的理论工具。国民性概念在内涵上显然包括人性，人性观的近代转换是国民性改造的首要内容，但是，国民性还要进一步深入考察不同的人性观所支配的具体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差异。

最后，国民性与民族性的内涵不一致。“民族性”或称“民族

性格”，主要是考察一个民族区分与另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非常稳固、极少变动的性格特点，是一个成熟民族的标志性特征。而国民性除了关注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民族性特征之外，还致力于考察这二者的时代性变动特点和规律。因此，国民性概念在内涵上包含比民族性更为丰富的内容。

综合上述辨析，本书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文化、社会心理及行为方式的特征的总和。从结构上说，行为方式的特征是国民性的外在表现形式，社会价值取向及其相应的道德伦理观念是其最深层的内在决定因素，社会心理居于二者中间充当桥梁的作用。任何秩序化的行为方式在上升到价值道德观念这一社会上层建筑的层次之前，必然已经内化为广泛的社会心理，脱离普世的社会心理的文化永远不可能居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地位；而任何高度概括、抽象化的意识形态，必得经由社会心理的转化，得到民族大多数成员的主观认可，也才能转化为自觉、有效的行为方式。而只有当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和价值道德观念三者之间达于和谐一致、有机统一时，才能形成稳定而成熟的国民性。否则，民族就面临着国民性转型的问题。

不同的学科对行为方式的界定有着很大的差异，①国民性所

心理学认为，“行为方式是人们心理性格特点的总和”，“是个人采取行动时所采用的行为的样式”；社会学认为，行为方式是“人们相互作用的模式”；文化人类学则认为，行为方式是人类本质的实现形式，是人类发展的存在形式；哲学视野中的行为方式是人们在自觉活动中采取的形式、方法、结构和模式的总称，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形式，是社会行动规律的具体体现。——李秀林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31—132页。

关注的是民族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所普遍具备、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的特征，所以我们把行为方式界定为风俗习惯，国民性所要考察的就是不同风俗习惯的特点，即某个民族行为方式的固有特征。确切地说，风习是已经定型为固定模式的行为方式。社会中的多数成员自觉遵循这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就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恰如哈耶克所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彼此相处，并能成功地按照我们的计划行动，这是因为在多数时候，我们文明中的成员无意识地遵从了某些行为方式，从而在其行动中显示出某种规则性。”“我们生活的世界之所以井然有序，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致迷路，都是因为我们遵从了这些惯例——尽管我们不了解这些惯例的意义，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风俗习惯包括 3 个方面的内容：生产（劳动）方式、生活（消费）方式和交往方式。劳动方式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活动方式，具体表现为不同的职业或谋生方式；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消耗和利用通过劳动所获取的生活资料和劳务的方式就是消费方式，它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的消耗和闲暇时间的娱乐、休息等活动。而所有的劳动和消费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中实现的，交往方式的不同集中体现着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差异。

劳动、消费、交往方式相互影响、密切联系，构成风俗习惯的整体现内容及特征。但相对来讲，劳动方式决定、制约着消费和交往方式；而交往方式则对前者有明显的反作用，积极、充满活力的交往方式自然会推动劳动和消费的发展，而封闭、凝固的交往方式的消

〔英〕哈耶克：《自由宪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96 页。